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BEIMEI HANXUEJIE DE
ZHONGGUO WENXUE SIXIANG YANJIU

北美漢學界的 中國文學思想研究

王曉路主編 劉岩副主編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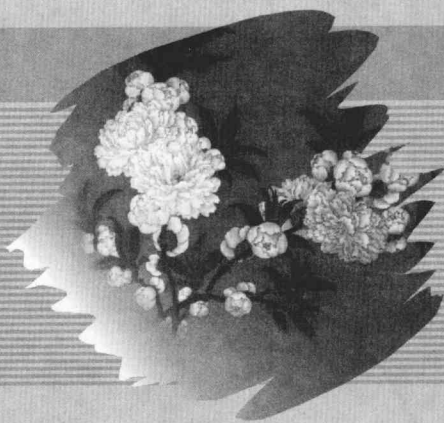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四川大學“211工程”重點建設學科項目

北美漢學界的 中國文學思想研究



王曉路 主編
劉岩 副主編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北美漢學界的中國文學思想研究 / 王曉路主編, 劉岩副主編.
—成都: 巴蜀書社, 2008. 8
ISBN 978-7-80752-157-4

I. 北… II. 王… III. 文學思想史—研究—
中國 IV. I20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8) 第 078017 號

北美漢學界的中國文學思想研究

王曉路 主編
劉岩 副主編

責任編輯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 (028) 86259397
網 址	www. bsbook. 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 (028) 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責任公司 電話: (028) 85011398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成 品	203mm×140mm
印 張	24. 5
字 數	600 千
書 號	ISBN 978-7-80752-175-4
定 價	60. 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工廠調換

序 言

，其中兼以比較詩學與文學理論學文圖中關係人重要學界
杰羅，等與林師學大拿倫大拿世，師學師學大拿里漢育中其
致倫學文圖中師界對人進獻。李順慶費又師學師學大拿
學文圖中師界人衣西為與，王所書師要重漢衣西至
師學最然顯示與中與師學對人進獻，“林林手一線”師學
圖中師學師學師學師學師學師學師學師學師學師學師學
其，師學師學師學師學師學師學師學師學師學師學師學
師學師學師學師學師學師學師學師學師學師學師學
從跨文明的角度，以變異學的方法來研究比較詩學和比較文
學，可以說是四川大學比較文學的研究特色之一，同時也是我們
的博士研究生群體持續關注的領域。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從英語
世界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進行集中探討，有的專門對中國文學理
論的某一個點進行專項深入討論，如對法文學界和英文學界對劉
勰《文心雕龍》研究的再研究。這些研究成果都無疑對我們本土
學界拓寬自身有着悠久傳統的研究領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和推進
作用。

在歐美漢學界中，北美學界的成果近年來對國內學界影響較
大，有關的出版單位相繼出版了不少譯著，如哈佛大學宇文所安
的系列論著和劉若愚《中國的文學理論》的譯文均不斷出版。然
而，西學框架中的中國文學研究，包括對西方漢學研究成果的再
研究，除了翻譯和引進之外，更重要的還在於對其進行相關性的
對比研究。在此基礎上，纔有可能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學理對話并
可持續地推進這一領域。
《北美漢學界的中國文學思想研究》的特點在於首先將北美

漢學界重要人物有關中國文學理論的研究與評論加以集中引進，其中有斯坦福大學的范佐倫、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林理彰、羅杰斯大學的涂經詒以及費威廉等。這些人所撰寫的中國文學理論近年來均發表在西方最重要的書刊上，成為西方人瞭解中國文學理論和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對這些研究的集中展示顯然是有價值的。其餘各章分別就北美漢學界的幾個關鍵性學者的有關中國文學思想進行了梳理和分析，並針對其問題進行了專項討論。其中包括華裔學者劉若愚、葉維廉、余寶琳，同時也包括宇文所安、蘇源熙等人。而且，此書還對北美漢學界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集中納入研究視野，比較全面地進行了整理和分析，其中美國著名學者鄧騰、華裔學者李歐梵和王德威得到了比較集中的討論。另外，附錄中還將北美漢學界對中國古代小說和戲劇理論的研究、美國已故著名女學者李又安有關中國文學批評術語以及余寶琳的有關中西比較文學的三篇重要文章收入，從不同側面為讀者提供了比較全面地瞭解北美漢學界研究現狀的窗口。

總之，對這樣一個問題的研究可以采取多種方式。如可以從中國文學思想的若干元命題出發，對比西方漢學界的做法，但問題在於設置問題本身可能過於主觀而陷入命題預設的困境。因而此書是以北美代表性漢學家為主要綫索，以對其中國文學思想的研究為論述重點，集中討論這些具代表性的漢學家對中國文學思想及文學觀念的發生、發展所進行的獨特觀察、分析和歸納，詳盡分析中國文學思想在北美的研究狀況，包括在不同文化語境、語言和文學傳統的差異中的接受、翻譯、評論，以此為國內學界提供理論、方法論和材料的多重資源，並在此基礎上拓展中國文

學的研究視野和可能性領域。因為每個學者的研究重點不同，這種由人帶入問題的做法亦可以避免一些主觀的傾向。

雖然我們今天在研究本土文化的時候，應當擁有國際視野和眼光，但也必須避免盲目的、消化不良的傾向。而目前在研究中國文學的領域中，國內學界也或多或少地出現了一些惟西方漢學家是從的傾向，這如同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中多次出現過的盲目跟在西學背後苦苦翻譯、追風、缺乏相關研究和自身的學術定位理念一樣，其結果必然是學術時尚風潮一過，即烟消雲散。其實，對西人的中國學研究，我們既要悉心研究，又不可盲目崇拜，因為西方學者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錢鍾書等大師早就對西人的局限性作出過睿智的點評：“黑格爾嘗鄙薄吾國語文，以為不宜思辨；又自誇德語能冥契道妙……其不識漢語，不必責也；無知而掉以輕心，發為高論，又老師巨子之常態慣技，無足怪也；然而遂使東南海之名理同者如北海之馬牛風，則不得不為承學之士惜之。”因而，《北美漢學界的中國文學思想研究》也有此用心，在國內學界對西方漢學界的情況有了初步瞭解後，并不一味追風，而是集中對其進行討論，采用譯、論結合的方式，以對學術思想作出我們的回應。這樣的態度和努力是可喜的。在四川大學“九八五”文化遺產與文化互動創新基地和“211工程”十一五規劃項目的平臺下，我們希望有更多這樣踏實的研究。

是為序。

導論

中國文學研究的多重資源

王曉路

進入新時期以來，中國的社會文化從整體上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觀念、文化形態到日常生活均可見證這種變化所帶來的巨大影響。在這樣一種新文化轉型中，中國人文科學中的文學研究範式也以文化視角、方法論和多重資源的借鑒為標識，產生了遷移。

衆所周知，中國文學研究有着悠久的傳統。由於文學研究是對文學行爲、文本系統和文學主客體經驗的解釋，所以現存的解釋方式必須面對變化的文本形態呈開放的系統。就文學研究而言，古代中國儘管在文類上有比較豐富的樣式，但在學術研究上主要是以幾種代表性的方法延續，即在內在理路上以以意逆志、推源溯流、意象論為代表，而在外在形式上以選本、摘句、評點等為代表。二者始終圍繞言意關係、情理路向展開^①。這種傳統的、位於自身文化語境中的研究方式至近代以降，則在全球化和

① 前者參見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後者參見蕭華榮《中國詩學思想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

西學複製的歷史階段中在整體上被迫改變，特別是在現代高校課程設置和學術的體制下，上述固有的研究僅僅留存在一些個體研究上。中國近代的學科複製使社會進程中出現了類似於西方世界的結構性解體或內部瓦解的問題，迫使知識界必須借鑒和消化西學資源和自身傳統中的認識論資源，並在此基礎上針對知識譜系進行清理。人文學術的再一次外轉，尤其是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的引進和實踐，使中國人文學術出現了較大規模的範式轉移。

在此歷史階段的語境中，人們一方面承接人文學術傳統，繼續對紙質文本中的構成性因素進行分析，努力挖掘這些文本中文字符號編碼的內涵與意義，另一方面又展開了對文本的外部條件的重新思考，即對文本形成的歷史、社會和文化的物質與觀念的制約或促進條件、文本的傳播與接受對文本生產和學術研究的影響、社會文本與文學文本的轉換、文本的翻譯和流傳、文學機構、社團、獎項等體制性因素等等進行整體過程的研究。這一注重過程的研究明顯地帶有文化批評的意味。文學研究範式的遷移所形成的觀察視角和研究範圍的蔓延，導致人們從新的文化角度、新的材料和新的方法對原有研究對象進行再思考。其中，對文本所置身的文化語境的範圍已不再拘泥於自身的傳統之中，而是將其納入該文學在異文化區域中的流傳、接受和研究之中加以反觀。文化語境的轉換和交叉無疑帶來了新的審視角度和可能性。從西方漢學界對中國文學的研究來反觀這一傳統領域，即以某種互為語境的方式切入到原有的命題當中，就是當代中國人文學界進行文學研究時值得關注的論域。

從新時期起，學界對異域的研究成果格外關注，陸續翻譯、

撰寫了一批有關的論著和工具書。據不完全統計，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就有趙毅衡《遠游的詩神——中國古典詩歌對美國新詩運動的影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等。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有關的論著和譯著開始增多。如忻劍飛《世界的中國觀》（學林出版社，1991年）；衛茂平《中國對德國文學影響史述》（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年）；張弘《中國文學在英國》（花城出版社，1992年）；孫越生、陳書梅主編《美國中國學手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中國社科院主編《世界中國學家名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羅浦洛主編《美國學者論中國文化》（包偉民、陳曉燕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宋柏年主編《中國古典文學在國外》（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年）；張國剛《德國的漢學研究》（中華書局，1994年）；倪豪士編選《美國學者論唐代文學》（黃寶華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侯且岸《當代美國的“顯學”——美國現代中國學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林徐典編《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文學語言卷）（中華書局，1995年）；樂黛雲、陳珏編選《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朱耀偉《當代西方批評論述的中國圖像》（臺灣駱駝出版社，1996年）；李學勤主編《國際漢學著作提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國際漢學漫步》（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黃鳴奮《英語世界中國古典文學之傳播》（學林出版社，1997年）；馬祖毅、任榮珍《漢籍外譯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劉東主編，樂黛雲等編選《歐洲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弗朗

索瓦·于連《迂迴與進入》（杜小真譯，三聯書店，1998年）；戴仁主編《法國當代中國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王曉平、周發祥、李逸津《國外中國文論研究》（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等。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這些論著和譯著繼續受到學界的重視，如夏康達、王曉平《二十世紀國外中國文學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王曉路《中西詩學對話——英語世界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巴蜀書社，2000年）；安田樸《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耿升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吳孟雪、曾麗雅《明代歐洲漢學史》（東方出版社，2000年）；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劉寧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安平秋、安樂哲主編《北美漢學家辭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何寅、許光華主編《國外漢學史》（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年）等等，不一而足。

與此同時，學界還對西方漢學家個人論著進行了譯介，如大陸學者和臺灣學者均對劉若愚（James Liu）先生的代表作《中國文學理論》進行了翻譯，臺灣學者的譯本也於近期在大陸出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論述中國文論、唐代文化與詩歌等的主要論著也不斷得到翻譯出版。文學界中的一些著名華裔學者，如夏志清、李歐梵、王德威、張隆溪等人的論著均受到學界和出版界的重視，他們的論著不斷得到譯介、出版和再版。這些跨文化語境的研究成果在中國學界引起了較大的興趣。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似乎西方漢學家的研究就是一種不可替代的範式，尤其是其材料、方法和角度上引發的問題成為學術界的熱門話題。

如前所述，中國人文學術從二十世紀起就在一種與西方人文學術的關係框架中運行。從近代開始，中國觀察世界和解釋世界的原創性知識體系在其現代化進程和現代性探索過程中發生了裂變，對原有思想資源的大力挖掘和重新認識、對西學思想資源的大力翻譯和研究，帶來了一種學術思想重組的傾向和知識學結構的變化。這使得中國學術文化的狀況一直受到中外學者的關注。如英國學者沃森就作了如下描述：“雖然孔子人生觀取得了一些不容置疑的成功，但其本身却是一種保守主義。考慮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巨大變化，孔子理論體系的失敗無法避免。”^①換言之，在國家治理和個人修行等等方面，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擁有很多鮮活的命題，這些命題無疑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思想源泉。然而這種資源在社會發展模式上却没有提供足夠的、可以通達到公共領域的倫理層面，并形成制度化文化遺產。因而，以公民社會、社會正義等為標識的現代社會理念在中國是十分晚起的翻譯型概念。因而國內學界在許多問題上將文化與制度功能混為一談。所以，唐逸先生特別指出：

我們的失誤還在於認不清制度的功能。制度規範人的經濟、政治、社會生活的權利。它限定人的利益和權限，對違規行為加以威懾、裁判、制裁，故效果明顯，立竿見影。各國制度之優劣，效率之高下，可以互相觀察比較，也就可以

①（英）彼得·沃森《20世紀思想史》，朱進東、陸月宏、胡發貴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第77頁。

學習借鑒，更有利於變革。制度之可比較，在於其功能的可觀察性和立竿見影的效果。一個社會，秩序是井井有條還是混亂胡來，資源是有效利用還是揮霍浪費，分配是大體公正還是民不聊生，官員是奉公敬業還是腐敗墮落，言路是自由公開還是壓制憤恨，國力是富庶強大還是外強中乾，民氣是舒暢凝聚還是一觸即發，總之，大凡關係到我們切身利益和生死攸關的一切，皆是制度的效果，而非文化的作用。

明白這個道理，也就不至於硬要文化來承擔制度的功能，說什麼國粹不能保護我們，為什麼要保護國粹？文化祇是精神資源，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與國力強大與否沒有直接的可證明的因果關係。而關乎國力（以及正義、程序、效率、安危）的乃是我們的制度。百年來我國的一切潰敗、羞辱、失誤、折騰、自相殘殺、國力內耗，全是制度之過，不是文化之過^①。

對文化與制度功能的差異混淆是學界頗具代表性的問題。當中國原有知識體系中沒有提供現代社會發展模式的對應點時，中國學界就必須面對新的問題，“中國的近代現代當代都面臨一個類似於近現代西方所面臨的生活世界內部的瓦解的歷史慣例”^②。而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範式轉型上，目前學界依然痛心於中國人文

① 唐逸《文化不關乎國力，關乎國力的乃是制度》，載《南方周末》2007年8月2日。

② 張旭東《批評的蹤迹——文化理論與文化批評：1985—2002》，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第3頁。

學術在國際學界中的相對劣勢。正如陳序經先生所言：“目前在國際學壇上，中國文化的發言權，顯然不在我們手中，如果從現在起還不加緊努力，我們的文化仍將繼續由外人曲解，甚至誹謗。這是我們應當接受的一頁慘痛的歷史教訓。”^①實際上，這種內部的瓦解在文化轉型期中均會出現，而且往往伴隨着外來文化的進入而產生新的裂變。因為文化的發展有兩類方式，一是內部自我更新而導致的新的生長期，二是在外來文化的影響下出現融合匯通期。與此同時，新的觀念却也會在轉型期的內部瓦解過程和與外來文化的交匯中出現。如佛教進入中國、傳教士引進的西學基礎以及對中國文化經典的翻譯、二十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以及當下中國社會的變遷等等。這些重大的文化史時期，也同時是中國文化包括中國文學極有生命力的時期。知識學的重組表現為一方面是對傳統知識體系的審視，另一方面又要對新近涌入的觀念和概念系統進行强行消化，在某種知識譜系的梳理過程中融合到漢語的現代表述之中，由此奠定人文學術新的話語系統以及言說和聯結（articulation）方式。由於人文社會科學具有“未完成性”或“不完整性”，這樣一種過程一直延續到今天便是十分自然的事。在新的歷史時段，中國人文學界對思想資源的渴求、對傳統理念的元命題的挖掘、對源自異域、尤其是西學傳統的篩選，與其說始終保持了高度的熱情和持續的努力，不如說是思想陳述內在需求使然。

^① 陳序經《東西文化觀》，牧童文史叢書 13，臺灣：臺北牧童出版社，1976 年，第 2 頁。

因而，在一百多年的歷史時段中，這一知識傳統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不斷地在新的層面上承接自身文化傳統、接納并融合源自不同文化區域的知識學譜系和現代解說方式，以形成新的傳統，或形成傳統傳承的有效方式。雖然傳統意味着一個流變或動態的系統，但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中國與西方人文學術的關係實際上是一種充滿張力的關係，現代西學的大規模引入，其知識結構已系統地將中國傳統知識譜系和結構予以分割，在一種西學命名系統中將中國傳統知識予以了重新組合，并在語言包括人文學術劇烈變遷的條件下使中國原有的言說方式變成了一種現代方式。其實，這種現代漢語的言說方式也是文化發展的最明顯的特徵，從中可以看到中國文化的包容力，而不是文化脈絡的截然斷裂。祇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當基於西方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人文學術作為了一種普適性的觀察和解說方式在非西方文化區域不斷得到某種複製時，其特殊的有效性在時空錯位時就有可能轉化為一種不同傳統間的對應關係和言說前提條件，因而，中國人文研究的範式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始終位於一種被動的關係框架中，以某種刺激—反應、翻譯—闡釋或接受—再現的模式延續自身的人文學術。雖然這種似乎過於簡單的歸納式劃分會引起誤解，但這種與西學的學術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人文學術的外部形態和內在理路，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面對這樣一種人文學術的狀況，中國當代學人的文化責任依然任重而道遠。

但是在這一階段中，學術界所出現的一些現象需要注意，如缺乏應有的耐心和系統的研究而急於進行西學“新說”的譯介、截取西學中的某些概念或範疇以及術語進行不同類型問題的硬性

言說等等；或以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以某種政治倫理學方式對人類共同的精神遺產進行無謂的意識形態消解，也在歷史上反復被證實是思想的極端愚昧。如果我們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民族主義”這一概念內涵的遷移，就會看到許多有趣的軌迹，包括比較文學在美國的狀況。同時，問題的解決既不在於某種空疏的學問，也不在於在學術範式上努力爭出民族氣節，以學術的二元對立，中國與西方、或國學或西學（包括漢學）的方式對待原本豐富、博大和深邃的思想資源，而在於具體的、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一種學理層面的挖掘與對話。這在原則上需要雙重的工作，其一，將西學中有關的知識點還原到其知識譜系結構的對應點中，并注意其流變和可資借鑒的原創力和嫁接力；其二，挖掘自身傳統中的元命題並進行篩選，融合到新的思想陳述之中，並針對具體的問題做出有效的探討。實際上，近代文學批評話語的流變是一個最為明顯的動態過程，這個過程不僅僅強烈地表現在中國大陸，在歐洲和美國等文化區域也是非常明顯的。因此，今天的學術依然是多重資源意識、語言能力、思想和問題的洞察等諸方面共同作用的過程，是一個非常具體的研究過程。

隨着全球化進程和對現代性問題的思考，文化資源問題成為了經濟、社會和文化三種系統中的中心問題。一般而言，文學研究特指以某一文學現象作為具體的研究對象，對其本質、特徵、規律和作用進行不同角度的探討，並按照現存的或原創的文學理論和審美方式對作家、作品、流派、思潮、文學活動、文學機構等進行分析和評價。這種研究總是隨着歷史文化的發展而變化和深化。由於文學是某一文化區域的人利用自身的語言和文化傳統

對內心世界和外在世界的獨特觀察和藝術編碼，因此它受制於該文化區域歷史時段的生活樣式，即始終處於個性系統、社會系統和文化系統三者的關係中^①。在人們不再拘泥於自身的文化語境，而同時將其他文化區域對自身文化的考量納入思考的範圍中的時候，固有的研究對象和範圍在理論和方法論的雙重借鑒中就被賦予了新的動力。

而作為世界文化寶貴資源之一的中國文化的各個分支，包括中國文學所內含的生命命題和精神的探索方式，却在一種與西學的現代性關係中凸現出來。換言之，原有的問題不僅依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而且隨着新問題的不斷出現，新老問題在新的關係框架中更為明顯。因為通過不同角度的觀察與思考，面對傳統的方式也隨之得到改變。正如美國當代學者利奇在論述當代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發展中所指出的：“（文學）理論家們在這一過程中，依次強調對現實世界及其教訓的反映、對內在真實與幻象、對詩學技巧運用、對社會歷史和政治的及其價值觀的再現，不斷發展變化。然而在這些歷史發進程之中，‘老’問題雖然退出了視線，但絕沒有消失，而且這些問題獲得重組並佔據了新的概念關係。”^②這樣一種問題意識和對問題存在方式的認同也同樣反映在傳統的學科中，如中國文學研究領域。就不同文化語境的反觀

① 參見勞思光著、劉國英編注《文化哲學講演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36頁。

② Vincent B. Leitch.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Criticism”. In Vincent B. Leitch, et al.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 5.

角度而言，這樣一種研究也有助於看到自身的缺陷和學科中的問題。年輕一代漢學家、美國耶魯大學中國文學教授蘇源熙（Haun Saussy）就曾着重指出：“其實研究不同文化的動機之一，便是探究我們自身尚未自覺到的態度與傾向，包括自己的偏見。”^①這一點已被西方許多有識之士，尤其是一些思想大師以及文化研究學者，如一些西方漢學家們意識到了。西方不少新近出版的權威文學理論工具書都增加了有關中國的詞條，這一事實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西方學界的學理性努力^②。

這種互為文化語境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為中國學界提供新的材料、理論支撐點和方法論，另一方面則可以通過對比性研究，看到一些問題，並提供一種具體對話的平臺。雙重資源的篩選有賴於對這種資源本身的充分瞭解，這是理解和對話的基本前提。而對於中國文學、文學類型、文論思想等方面的研究，西方學者（包括華

① 蘇源熙《主觀與客觀、西方與中國之定名和虛位》，載《中國學術》2001年4期，商務印書館，第337頁。

② 如 Alex Preminger and T. V. F. Brogan, eds. *The New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增加了“Chinese Poetry”和“Chinese Poetics”的長篇詞條。Michael Groden and Martin Kreiswirth, eds. *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也增加了“Chinese Theory and Criticism”的長篇詞條。該書1994年版的詞條在2005年版中又有了不少新的修訂。